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4
23 Sept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1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开始一般性辩论〔9〕

下列代表发了言：

德阿布雷乌·索德雷先生（巴西）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阁下讲话

下列代表发了言：

达纳巴兰先生

（新加坡）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零5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

主席：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发言者名单将于9月23日星期三下午6点停止登记。我谨请各代表团提供对发言时间的尽可能精确的估计，使我们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会议。

德·阿布罗·索德雷先生（巴西）：怀着对联合国的再次萌发的信心和对联合国在加强各国人民间的和平与合作方面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深刻感受，我第三次来到这个讲坛。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这里派有代表，他们是本大会每年劝说人们进行的普遍与平等交流的主角。大小国家都在这里发出自由和主权的呼声，讨论重要的国际项目。

巴西有幸颂先进行这一辩论，使我率先恭贺阁下先生当选为本届大会的主席，并衷心祝愿阁下在任期内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也要向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胡迈荣·乔杜里先生表示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我负责，执行在民主中再生的巴西的外交政策，坚决地追求巴西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愿在国际上进行坦率的对话。

巴西绝对忠于自己的外交传统，正在坚定不移地建设自己的未来，决不在现代世界现实中的困难面前气馁。世界的现实并不跟随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也不总是与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相一致。

所谓的“多边主义的危机”妨碍了国际生活法治的努力，削弱了国家间合作的基础。

我们的世界再也不能容忍少数国家横行霸道，多数国家俯首称臣的局面的出现。企图在国际社会的结构中建立寡头统治的阴谋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僵化、孤傲的方针、摩尼教式的二元论，或武断地瓜分世界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再也行不通了。只有当国际秩序变得更为民主的情况下，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可以发挥其必要的作用。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把自己的概念和解决办法强加到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上去。每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忽视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我满意地注意到，两个超级大国正通过两国领导人——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米·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之间的直接对话，寻求更有益的了解与相互信任，我们深信，这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这里应该同样乐观地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最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这一会晤具有历史性意义，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成熟和建设性关系的积极发展。

多边外交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生气，令人鼓舞。这种生气的迹象之一就是决定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区——这项决定对于实现联合国的原则与宗旨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中美洲持续了十多年的冲突也即将有和平解决希望。

联合国组织的存在象征着人类认识到，只有通过对话与说服才能和睦地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安全理事会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关于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第598(1987)号决议，表明安理会有能力采取建设性的行动，通过和平和谈判的途径来解决冲突。这一符合《宪章》规定的维持和平行动使得我们相信，在其他问题上，安全理事会能够以同样的和解精神行使自己的权威。我相信，安理会的外交潜力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

正是根据这样的信念，巴西决定竞选分配给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席位。巴西相信自己能够在今后两年中，为重新发挥安理会作用和解决各种影响着和可能影响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作出建设性贡献。我们已经荣幸地得到了拉美集团的一致支持，希望也能够在本届大会上获得同样的信任。

同国际政治局势最近出现希望的曙光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漫长的经济危机的局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及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的一筹莫展，是同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问题的两种表现。

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命运与忧虑，以及这些国家实现进步与成就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的事实，不幸都引不起人们的关心。我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决不会放弃实现自己进步与成就的权利，不仅相信我们的这一要求是正义和合法的，而且深信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另一个使国际社会感到忧虑的问题是有人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行为使得政治危机进一步恶化。我在去年大会上指出，凡是目前仍然存在使用武力的地方，那里出现的已不再是胜败的问题，而是僵局。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不仅仅是非法的，而且已被证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海湾地区亦是如此，在那里暴力的机制已失控。南部非洲也是如此。种族隔离政权无理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南非对其邻国采取敌对行动、发动侵略，从而导致南部非洲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这种局势的继续完全是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偏执、短见与蛮横所造成的；这种局势的继续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也违反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

另一方面，日益迫切的是进一步推动为在中东取得持久、全面与正义的和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巴西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必要性日益迫切。在此我重申我们对黎巴嫩人民所受的苦难表示关切。黎巴嫩的完整理应得到尊重。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的参与下，有关各方之间所达成的谅解能迅速促使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终止各种形式的外来干涉，以便阿富汗人民行使自决的主权。

我们也关切地注意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僵局仍在持续。巴西承认阿根廷的主权，希望有关各方听从大会一再发出的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的各个方面。

我高兴地注意到我国总统何塞·萨尔内1985年在讲台上就南大西洋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已成功地变为现实，积极努力的成果是大会1986年10月27日通过了第41/11号决议。南大西洋和平合作区的建立表明，国际社会赞同该地区的南美洲及非洲国家维护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在和平、自由的环境中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作的决心。

为了使这一决定得以彻底贯彻，其它国家也必须真诚地进行合作。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军事举足轻重的国家尤其应该完全尊重指导这一地区的和平法规，不要介入与其无关的充满角逐与冲突的地区去。我必须指出该地区仍有严重的紧张焦点，有碍于充分实现大会通过的这一决定中的目标与原则。

在这一和平论坛的讲台上，我也希望表明巴西满意地注意到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达成历史上的第一个核裁军协定。若美国与苏联如同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就中程原子武器达成一项谅解，我们则将看到一个名符其实的裁军步骤，它将不同于以往权且管理军备竞赛的各项协定。

拥有更多武器的国家显然对裁军进程负有主要责任。但毋庸置疑，其它国家也有权参与对一些问题的决策进程，这些问题虽由某些国家引起，却毫无例外的影响到其它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超级大国间的谈判必须与多边裁军论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负有具体任务的裁军谈判会议联系在一起。

正如我在第七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已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我们重振经济的努力也遇到了一个不利的现实国际环境。现实中的结构并非缩小差距，反而进一步突出了这些差距。我当时也表明，以旧的模式来塑造新的模式有碍于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增长与发展，有碍于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公正的国际体系。

大会第41/202号决议中所阐明的有关外债问题所达成的谅解表明，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现在则应进一步巩固这一进展。我在此重申我国坚定不移的

明确立场：我们承认自己的国际金融义务；我们将根据公平合理的条件解决我们的外债。巴西力求克服自身的困难，为此我们已全力以赴，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但巴西不能使自己的发展遭到危害。

发展中国家努力把握住日益增多的经济机会，但却受到工业化国家在金融、货物与服务贸易，特别是接受最新技术方面所施加的重重限制。

有一种倾向破坏发展中国家为确保他们人民有一个尊严、繁荣的未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这种倾向使这些国家有更公正、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的期望破灭了——不仅是期望，而且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西除了发展，别无它途。我们必须满足众多人口的迫切需求，而他们大部分都来自于贫困和苦难的阶层。对我们来讲，发展已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绝对必要。

发展中国家为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的同时，只有采取有效行动纠正对现存的科学、技术知识转让政策的歪曲，这种努力才能产生效果。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发达国家正大力设法建立新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对我们的利益将会是更不公平和有害的。因为它将阻挠我们获得接触最新科学发展，掌握现代技术的合法权利。巴西总统萨尔内在九月四日宣布巴西掌握了浓缩铀的技术时说，巴西不能放弃其广泛、不受限制地对全部现代科学知识和应用的权利。

在这里我愿重申我国关于仅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保证。这一保证不但无可非议而且被巴西和其它姊妹国家一起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技术发展所证实，这一发展增强了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互相信任。特别是巴西同阿根廷之间进行合作的主动行动将保证拉丁美洲在不发展原子武器的情况下，掌握核周期。在公布巴西掌握了浓缩铀技术时并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和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在来往的信件中强调了双方这一共同目标。

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出能对自己的问题寻找实际和有独创性的答案，这十分令人鼓舞。在这儿我想提到孔塔多拉集团在巴西也是成员国之一的支持集团的政治支

持下，为寻求一项解决中美洲冲突的真正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而采取的有力行动。

我代表我国政府赞扬八月七日在危地马拉所达成的重要谅解。中美洲五国首脑对解决中美洲冲突表示了明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决心。巴西认为签署的协议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巴西积极关心各方应达成谅解，并为此做出了贡献。这些谅解的结果是八月二十二日在加拉加斯通过了一项决议，建立国际核查和监督委员会。

巴西认为最近有关寻求和平解决中美洲危机所采取的步骤表明这个地区的国家本身也能寻求结束影响到整个拉丁美洲的冲突的解决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同该地区有联系和利益所在的国家都应该避免作出会使这一解决办法难以执行的任何表示。

拉丁美洲为本洲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由于“协商和政治协调常设机构”的建立而得到证明。这一机构的建立是两年多来孔塔多拉和支持集团的八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成功地接触所取得的成果。

这些国家上个月在圣保罗决定举行定期的总统级会议，这说明在里约热内卢开始的地区性协调进程正在迅速地成熟。事实上，八国集团本身就是更广泛的区域谅解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的另一方面是为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所做的新努力。为此巴西同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一起在许多场合上给予提倡，例如：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丁美洲能源组织和卡特赫内协商一致组织。

我愿在这一国际讲坛上重申我国重视去年初同阿根廷，乌拉圭所签定的有关平等、经济合作的协议。它们具有真正历史意义，证实了我们作为兄弟决心共同进步，加强我们的民主体制，为一个日益接近于实现的更伟大的事业：拉丁美洲一体化做出贡献。

我今天在这儿所讲的比去年更乐观和充满希望。这是由于当前整个国际局势具有积极面。

虽然怀有这种希望和乐观的心情，但面对国际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比例失调和不公正现象，我仍无法掩饰我的失望乃至义愤。近来，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了进展，但与此同时，消除苦难和贫困的斗争却未见任何起色。相反，在贸易、金融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的麻木不仁和顽固不化却日趋明显。

巴西目前正处在确定其政治和体制方向的关键时刻。我们即将在完善我们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一部新的宪法。

巴西准备沿着和平与建设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条道路将引导我国人民，在与所有友好国家日益谐调关系与密切合作的同时，走向进步和繁荣。

上午10点45分会议暂停，上午11点复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发言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发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不胜荣幸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里根总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秘书长结束中东和平之行返回总部。成千上万的人民已经葬身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流血冲突之中。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在祈求这场残杀得以迅速停止，我们祈祷秘书长不仅是一位跋涉者，而且也是该两国之间永久和平的缔造者。秘书长先生，美国支持你，愿上帝指引你进行今后的艰苦工作。

和秘书长一样，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在进行一场长途跋涉。我们来自每一个大陆、每一个种族，代表着大多数宗教，聚集在这一伟大的希望之厅里，以和平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当然，现在外交是一门微妙而机敏的技艺，因为至少可以从如下这一例子中看出：当十九世纪一个最精明狡猾的外交家去世时，其他外交家在获悉有关他死讯的报道时纷纷询问：“你说，这只老狐狸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涵义？”

然而，想要具备真正的政治家风度，光靠技巧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更伟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远见，即对目前形势和对未来的机会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今天到此来就是要向大家阐述世界未来之我见。我认为，从根本内容上来说，所有美国人都持有我这种观点。我要说——希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要介意——我们美国人认为，尽管地理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但规划未来的首要着眼点不是大陆和海道。着眼点不是国家铁血武力的储存，也不是货币储备和工业能力，——虽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首要着眼点非常简单，但其意义却更为深远，那就是人类的心。

放眼今日世界各地，人类心灵上的憧憬正在重新指引着国际事务发展的方向，使得唯物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神话大白于天下。我们只需要看一看我们时代志上大书特书着的普通老百姓的朴质愿望就足够了。

去年，菲律宾的普通老百姓重新点燃了民主精神的烈火，恢复了选举进程。有人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同样的奇迹——向民主过渡——正在大韩民国出现。海地也在进行过渡。当这些新的年轻的民主面临冲突和挑战时，有些人感到绝望。但在民主社会中，成长中的痛苦是正常的。美国曾经历过这种痛苦，地球上其他每一个民主社会也一样。

在拉丁美洲，人们可以听到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这是一支普通人民的进行曲，他们既不穿军服，也不扛长枪，而是穿着日常简便的工作服，一个挨一个排队走向投票站。十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民生活在民主社会或正走向民主社会。今天，这些人民已增至百分之九十以上。

但是，这场世界性民主运动并不是普通人民引导我们现在这个大会厅里的人——据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在世界各地，从普通人民工作的厂房里不断涌现出新的商业、新的经济增长和新的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极其美妙的梦想。

在美国，企业能力由于减税和放松管制而获得新生，成为目前经济扩展的动力。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说，自从这一扩展开始以来，我们在国内创造的一千三百五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中，四分之三以上来自雇员不满一百人的小型企业，也就是那些勇于冒险的普通人创办起来的企业。而且，我们很多新的高级技术就是在初出茅庐的企业家的车库里诞生的。市场的解放使得人民活力得以释放并使梦想得以实现，美国并非唯一的例子，甚至连最好的例子都算不上。

在印度和中国，农民市场更为开放，使得生产蓬勃发展。在非洲，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其政策，有些允许农民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提高了粮食生产。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四周新近取得工业化的国家里，服务行业、制造业和农业中的自

由市场使得经济和生活水准飞跃增长。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日本、朝鲜和台湾创造了过去二十年来真正的经济奇迹。在上述每一个国家里，魔力大部分来自作为企业家而成功的普通人。

拉丁美洲正在研究自由市场、更大的机会和增长的经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巴西总统萨尔内的讲话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私人的积极主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不错，使普通的人的梦想展翅高飞的政策正在传遍全世界。从哥伦比亚、土耳其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削减税收，审议各项规则，开放各种机会，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这幢大楼的许多会议厅里，关于“发展权利”的言论已经谈得很多了。但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发展本身并不是一项权利，而是权利的结果：拥有财产权，自由买卖权，合同权，不受过分税收和管制权，精简臃肿庞大的政府的权利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税收率低的国家比税收率高的国家享有更大的增长。

我们都非常熟悉“地下经济”的现象。一位叫埃尔南多·德索托的学者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一个国家——秘鲁——的形势，描述了一个旨在逃避沉重税收和令人窒息的管制的穷人的经济。这个被这些研究员称为“非正式经济”的经济是许多货物和服务业的提供者，并且常常是向上移动的唯一阶梯。

在首都城市，它几乎占所有的公共运输和大部分街道市场。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多亏了非正式经济，“穷人能够工作、旅行，并有房子住”。他们本可以补充说，通过自己变成地下企业家或为他们工作，穷人变得不那么穷了，国家本身比较富了。

那些主张用国家集权统治经济的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的人应注意，自由市场是通往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一条真正的道路。不象许多其他道路，这条道路引导人们取得某种成就。它是行得通的。

因此，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找到世界未来的地图的地方：在普通人的心中，在他们对自己和其儿童的希冀中，在他们和全家每晚躺下休息时所作的祈祷中，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是地球上的巨人，世界的真正建设者和千秋万代的规划者。如果他们真的获胜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获胜的，我们将最终看到一个和平与自由、机会与希望，是的和民主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类精神最终战胜古老、熟悉的饥荒、疾病、暴虐和战争之敌。

这是我的梦想——美国的梦想。我承认，一些在这个大会堂所代表的政府有其他想法。一些政府不相信民主，或不相信政治、经济或宗教自由。一些政府相信专制统治——无论是一人、一党、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或一个先驱者的专制统治。对这些政府我只想说，压迫的代价是明确的。你们的经济将越来越落在后面。你们的人民将变得更加焦躁不安。现在聆听人民的希望不是要比以后听他们的咒骂更好吗？

然而，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一个共同的希望把我们大家汇集在一起进行这一共同朝圣，这就是人类有一天将化剑为犁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的希望。

在当今地球上，和平最需要朋友的地方莫过于中东。中东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正在增强。美国将继续积极参加有关方面为走到一起以消除分歧和建立公正、持久和平而进行的努力。

这个月标志着伊朗——伊拉克之间战争开始进入第八个年头。二个月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停火、撤军和谈判停止战争的强制性决议。正如我们支持秘书长最近的访问使命一样，美国完全支持实施第598(1987)号决议。我们对伊拉克接受该决议表示欢迎，但对伊朗不愿意接受该决议仍然感到失望。

在这一方面，我知道，伊朗总统明天将对代表们讲话。我借此机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要求他宣布伊朗是否接受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如果答复是肯定的话，那将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和重大突破。如果答复是否定的话，安理会除了迅速通过强制措施外，别无他择。

40年来，美国一再表明，它与波斯海湾和其毗邻的國家的安全休戚相关。那里的石油储藏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具有战略意义。我们致力于保持石油的畅通无阻，并防止任何敌对势力控制该地区。

我们不谋求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对抗或麻烦。我们的目标现在是，并在每一个阶段一直是寻求在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的手段。我们在海湾地区海军存在的增加并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是对加剧的紧张局势作出的反应，并且是在与我们在该地区的朋友磋商之后这样做的。当紧张减少时，我们的存在也将减少。

美国对最近许多外交事态发展感到满意，例如一致通过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阿拉伯联盟最近在突尼斯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以及秘书长的访问。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苏联在起草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和就此达成协议中起了作用。但是在安全理事会以外，苏联人却做出不同的举动。他们要求我们海军从它驻扎了40年的海湾撤走。他们诬告，海湾紧张的根源有点来自美国，而不是战争本身。这种说法是无助于事的。他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大家面临的挑战上转移开，这就是公正地结束这场战争。

美国希望，苏联人将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起竭力争取结束一场永远不应该发生的、早就该结束的、和已成为战后时代重大悲剧之一的冲突。

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苏联继续占领着阿富汗。在将近8年之后，有100万人伤亡、大约400万人被迫离乡背井，战斗比以往更加激烈，苏联撤离的时候到了。

阿富汗人民必须享有在不受外国胁迫下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没有任何借口延长一场残酷的战争或扶植一个寿命显然不长的政权。该政权提出表面上妥协但实际

上将确保其永久统治的政治建议。这些建议未能经受唯一重要的考验：它们遭到阿富汗人民的拒绝。抵抗力量日益壮大。它是谋求谈判解决中必不可少的一方。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坚决主张真正的自决；苏联迅速和全部撤军；以及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可以试图向少数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今年改变投票立场。但是我知道，象往年一样，大会将以压倒的多数投票赞成阿富汗独立和自由。

我们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所作的愿意撤军的讲话。今年4月，我要求苏联今年确定开始撤军的日期。我现在在争取和平的讲坛上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我保证，一旦苏联令人信服地表明它准备真正实现政治解决，美国准备提供帮助。

让我对这一问题补充最后一点。巴基斯坦在强大的压力和恐吓面前向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我们向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勇气表示敬意。他们应得到我们大家的大力支持。

另一场众所周知的地区冲突正在中美洲——尼加拉瓜进行。

我要对今天在座的桑地诺代表团说：你们的人民知道你们政权本性。他们看到自由遭到压制。他们看到1979年的诺言没有兑现。他们看到实际工资和个人收入自1979年以来下降了一半，是的，下降了一半，而你们党的上层人物却过着特殊和奢侈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苏联集团仅去年就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尽管你们拥有中美洲最庞大、装备最好的部队，你们却在国内面临一场人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抵抗力量能够深入你们的心脏地带自由活动。但是，这场革命不应该使你们感到惊奇。这只是一场你们原先答应人民但后来食言的革命。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的目标是简明的。这也是尼加拉瓜人民和自由战士的目标。这就是民主、真正、自由、多元化、宪法的民主。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将不会，国际社会也将不会接受意在掩饰永久性专制统治的假“民主化”。

今年是我国宪法二百周年，我们懂得，真正的民主依赖于防止权力集中的体制结构的保障。正是这点保证了各种权利。暂时放松控制——过后可以再收紧——绝非民主化。

我再次向桑地诺阵线表示：我仍希望尼加拉瓜成为我们十年来在整个中美洲所看到的真正的民主变革的一部分。我们赞扬《危地马拉协议》所体现的原则，这一协议把中美洲民主国家的安全问题与尼加拉瓜的民主变革联系在一起。你们现在应当关掉威胁邻国和摧残本国人民的军事机器。你们必须结束对国内政治活动的扼杀。你们必须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全国选举。新闻媒介必须获得真正自由——不受检查、恫吓或诸如不发给新闻纸或恐吓记者及其家属之类的间接措施的破坏。必须准许被流放者返回，从事宗教活动、生活、工作、以及组织政治团体。这样，当结束了宗教迫害、监狱中不再关有政治犯时，全国和解与民主才可能实现。

除非出现上述情况，否则，“民主化”只会是个骗局。而在此之前，我们将支持那些为真正民主而战的人，以求实现真正的民主。

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柬埔寨、东欧、南非或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不只是个内部问题。持不同政见的捷克作家瓦克莱克·哈维尔不久前向全世界警告说：“尊重人权是真正和平的基本条件和唯一真正保证。”安德烈·萨哈罗夫也在其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说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具有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以及旅行和根据自己愿望选择居住国的权利的开放社会，国际信任、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无法想象的。”

自由有利于和平。而谋求和平也必须有利于自由的事业。耐心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建立一个使二者都能兴旺的世界。我们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的改善的前景而感到鼓舞。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上星期访问华盛顿，同我和舒尔茨国务卿进行了会谈。我们讨论了所有问题，包括我为首次大幅度削减美、苏核武器所进行的长期努力。例

如，六年以前，我就美、苏中远程核导弹提出了“零点方案”。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已就消除美苏整整一个部类的核武器原则上达成了一项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条约。我们还同意在一切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中加强外交努力。

为此目标，舒尔茨国务卿同苏联外长一个月后将在莫斯科再次举行会谈：我今秋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会晤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我们之间继续存在分歧，并且很可能永远如此。但这却使我们负有特殊的责任，寻找某些方式——现实的方式——使我们之间的竞争更加稳定，并向全世界作出建设性榜样，表明进行交流的价值与和平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能性。

让我补充一句，我们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寻求以防御而不是进攻来维持和平的途径，以保持威慑并最终使弹道导弹过时。战略防御计划大大增强了真正削减军备的前景。它是我们为确保世界更安全战略平衡更稳定所作努力的关键部分。

我们将继续追求削减武器的目标，特别是总书记和我已一致同意的目标——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50%。我们将继续迫使苏联人在解决地区冲突中采取更富有建设性的行动。我们期待苏联遵守《赫尔辛基协议》。我们希望看到苏联人民在自己国家内享有更多的自由，以及同我国更多的民间交往；我们还希望看到苏联在实际作法上承认迁徙自由的权利。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现在认为是磨擦甚至危险的根源，会变成我们与苏联之间合作的榜样。例如，我曾提议一道合作，在柏林减少东西方之间的屏障，在整个欧洲也可以更广泛地这么做。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欧洲成为无论以围墙还是枪炮形式出现的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作法，不再成为个人和整个国家进行自由选择的障碍。我还呼吁苏联在其军事力量、政策和计划等方面信息流通有更加开放，以使我们关于削减武器的谈判能够在更大的信任中进行。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苏联进行变革的消息。我们极为关心这些变革。我们听到译为“开放性”的“Glasnost”这个词。在英语中，“开放性”具有广泛的意思。它指自由和不受制约的信息，思想和人民的流动。它意味着政治和学术

的充分自由。我们希望，为了苏联人民的利益，这种变革将会到来。我们还希望为了和平，这种变革还将包括一项尊重其他国家人民自由与独立的外交政策。

这个大厅是讨论和平问题的最佳场所。第一任秘书长赖伊在谈到联合国时说：

“由于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在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消防部门的情况下，应由左邻右舍一道建立起自己的消防队，这是常识。”

大家一道扑灭战争的烈火——这一概念与《世界人权宣言》一道，是联合国的基本理想。我们不断面临的挑战的任务是保证联合国实现这些希望。

正如秘书长不久前所指出，由于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则，世界出现混乱的危险已经增大。大会在占领阿富汗的问题上已多次承认了这一点。《宪章》在今天拥有具体的实际意义，因为它涉及我刚才提到的人类愿望的所有方面——对民主和自由、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渴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护世界人权宣言，使之免受诸如臭名昭著的“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决议所带来的糟蹋。我们绝不允许以所谓新世界新闻秩序的诡计来控制新闻媒介和推行新闻检查的企图。我们必须反对在专门机构和技术机构的工作中掺进引起争议和无关的问题的行为，我们在那里寻求的是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直至核扩散等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紧迫问题上取得进展。这种行为玷污了《宪章》，削弱了本组织。

已进行了重要的行政和预算改革。这些已起了作用。美国保证在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恢复交纳会费。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联合国建立于伟大的梦幻和理想之上。有时她走入了歧途。现在是回转的时候了。

哈马舍尔德曾经说过，“政治努力的目标必须是使个人在安全和自由的生活中过得幸福。”这不应成为我们在今后的宗旨吗？

今天我谈到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以及妨碍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年青的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访问了美国。 在这次访问之后，他预言未来的世界有美俄两大强国，他说美国将“以犁”建国，而俄国将“挥剑”开拓。 然而，情况必然如此吗？ 难道不能化剑为犁吗？ 难道我们和所有国家不能和平共处吗？

在目前我们的思想被敌对情绪缠住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有许多东西在维系着全人类。 也许我们需要某种外来的太空压力，迫使我们承认这种共同的纽带。 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们面临来自本星球之外的一种异己威胁，我们这个世界的分歧将会很快地消失。 但是，我不禁要问，在我们中间不是已经存在着一种异己的力量了吗？ 难道还有什么比战争和战争威胁更加是同我们人民的普遍愿望不相容的异己力量？

两个世纪之前，在费城一个比这个大会堂小得多的会议厅里，美国人开会起草了一部宪法。 在他们辩论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位指出，新政府若要建筑得高大牢固的话，就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顺乎人民的意志并取得人民的赞同。 当时的新政府就是这样建立的，此后也一直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今天要说的主要意思是，平民百姓的理想已经升华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这些朝圣的外交香客要达到同等高度的话，我们一切作为的依据就必须是完全顺乎人意，合乎人心并取得他们的赞同。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发言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日本首相的发言。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我请他向大会讲话。

中曾根先生(日本)：我首先愿对阁下当选为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以您在联合国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您卓越的智慧 and 领导才能，您一定能指导本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我还愿对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阁下担任第四十一届大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特别是他在进行联合国行政和财务改革方面所做的协调工作，向他表达我真诚的敬意。

我还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的深厚敬意，他为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伊朗——伊拉克冲突做出了辛勤的努力。

首先，我衷心欢迎美国和苏联上星期在原则上达成的关于彻底消除中程核武器并在今年秋天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议的协议。他们在政治上的决心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我愿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两年前，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就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时，我曾强调说，如果我们想要拯救地球免受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毁灭之危险，并确保人类生存本身就必须有一种崭新的全球性的道德及维持这一道德的各种体系。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表示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这种态度要求我们承认世界上各种文化及文明的多样性和价值并相互尊重和欣赏对方的文化及文明。我认为，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联合国应当成为创造为全人类所拥有的一种全球性文明的动力。

我的讲话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我感到很受鼓舞。今天我愿就如何采取实际行动实现我的那些想法同诸位交换意见，并且谈谈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及日本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我们离二十一世纪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回顾以往，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充满了翻天覆地的事件和动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本世纪的前半叶，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核武器爆炸的灾难。此后，我们又一直由于核武器储存的不断增长而受痛苦的折磨。两个核超级大国双方目前都部署了大量的洲际导弹，达到了超杀伤的程度，可以直接打击对方的要害地区。尽管双方都认识到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即以威慑求安全这种作法本身就带有导致灾难的危险，但是他们至今未能就有关削减并消除核武器的各项安排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经济方面，进入本世纪不到三十年，世界任凭保护主义泛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次灾难性的大萧条。后来，世界经济复苏，摆脱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和贫困，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是，由于两次石油危机，世界又一次陷入混乱，而且至今未能完全摆脱这场混乱。我们将继续面临的全球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南北之间的差距，全球贸易不平衡及国际金融的不稳定等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

在另一方面，本世纪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使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的成就不免相形见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宇宙的广阔的外空到生命本身从中

起源的微观物质，人类在许多领域的知识的增长都大大改善了人类物质福利状况。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运用，这些知识可以使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果不能正确运用，不加以妥善的控制，这些知识则可以危及人类生命的尊严，给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随着世界各地人民，特别是亚洲和非洲人民为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和自由而努力，本世纪目睹了众多的独立国家的诞生。这些新的国家相继加入了联合国。几乎一夜之间，世界上独立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寻求着自由、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然而，人类至今未能在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中消除贫困和饥饿，未能摆脱种种地区冲突。

同时，由于通讯和交通工具仍在不断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世界统一性亦日益增强。

当这个充满灾难又充满希望的不平凡的世纪即将结束，我们展望新世纪之际，我们应当给我们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以及以后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应当使世代接受哪些教训？

难道人类别无选择，只能终日处于核武器——犹如悬挂在一根细线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之下吗？难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样一个地球吗？在这个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剥夺了宝贵的空气和绿色的植物，而这些是在四十亿年的时间里逐渐演变而成的。难道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只能传给下一代这样一个世界吗？在这个世界上人口猛增，一些国家极度贫困，不知科学、技术及现代工业为何物？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在此代表的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必须重申各项基本原则，在三个优先领域采取一致行动。

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领域应当是，争取并加强世界和平。各国不仅应为各国自己的人民服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努力尊重并保护普遍的人类价值，这是超越国界的。这意味着尊重生命和人权，保护一旦失去就无法补偿的自然环境，保持各国文化传统，这是世世代代人类智慧与辛勤劳动的结晶。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政府制度，都应当尊重这些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不正当地将它的权力扩张到它的疆界之外。

我们的第二个优先领域应当是，提供更多的保证，使人员、信息和文化能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我曾在其他场合作过这样的估计，即如果那时有能够自由接收的卫星电视广播使各国人民能够相互认识到，他们同属人类的一样的种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发生了。确实，我相信，得到保证的更为自由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将提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的保证，避免暴行的重演，使各国人民在这个世界提供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多样性中分享共同生活之欢乐。

我们的第三个优先领域应当是，纠正地区的差距，保护全球环境。为了这一目标，各国都不应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主权，而应当努力加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构架。当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应当找到新的方法加强全球权威的能力。

H·G·韦尔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真正的国籍是人类。”作为超越各国国界的全球村的成员，我们每一位都应当在我们的良知的鞭策下运用我们在本世纪所获得的智慧寻求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

在我两年前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中，我曾呼吁发展一种“全球道德”，刚才，我又谈到“全球村”。这些说法在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使用，因为很明显，一方面，各国及人民间的交流及相互依存将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全人类将日益面临着全部被毁灭的危险，一旦现代文明的成果被滥用的话。二十一世纪的人将只须把自己视为全球村的公民。

村庄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帮助。在我家乡内，如果有人没饭吃，就会有人拿出自己的饭来同他分享。这一哲理同样适用于地球这个村庄。约翰和伊万同属没有任何区别的村庄。正因为这样，《联合国宪章》才告诫我们“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是实现其崇高目标的第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强调了我们应追求的目标，以及指导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某些颇为理想主义的原则。我现在想讨论一下当今世界严峻现实带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为建立最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实现和平共处所需要的信心而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和苏联上周就缔结一项关于彻底销毁中程核力量条约而在原则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削减核武器历史上的第一项协议，也是在该领域内向前迈出一大步。我坚决赞成在地球上彻底消除中程核力量并衷心欢迎这一喜讯。我希望，作为下一步，美国和苏联在维持威慑平衡的同时迅速而稳步地实现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百分之五十的计划。

这种努力的成功将在两国人民中间产生密切的情谊并获得全球的支持。在核武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其它武器等裁军方面和在加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制度方面能取得进一步进展。这必定会导致在解决区域问题上取得进展，并打开通往和平的新大道。我认为，真正的世界和平是我们可以留给后代的最丰厚礼物。

我已利用一切机会敦促美国和苏联在核裁军方面尽快取得真正进展；我个人将继续为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而合作。

这些艰难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很有可能在研究细节和起草协议正式文本时会出现一系列障碍。正是此时此刻，不应由官僚或军人来解决问题，而应由目光远大、对人类负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们的政治智慧来解决问题。我诚恳地希望，作为真正政治家的两国领导人会作出人们不会忘怀的明智的政治决策。

我愿在此表示强烈希望，苏联领导能在其对亚洲的政策中采取建设性立场，并且特别是在同日本关系问题上，坚定地努力解决领土问题和其它未决问题，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

二十世纪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不加解决而留到二十一世纪。

第二个紧急问题是必须协调努力来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 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各国的政策必须协调一致，特别是要抵制保护主义。 在乌拉圭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是为了反对保护主义，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确保实现其目标。

我们不应把南方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视为人类的命运而无可奈何。 虽然他们的领导人自助努力对于解决他们问题显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有些问题，如最近的债务积累和出口困难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世界经济和工业结构的变化所造成，而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南方国家。

每当世界上任何地区出现经济问题时，为了该地区人民和世界经济稳定，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解决问题，并为避免危机而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手段。国际金融组织的各项活动和许多国家的各种共同努力已表明了这种合作； 我们应该更为明确地重申我们促进这些有效努力的决心。只有这样，世界上全体人民才能真正将自己视为超越国界、团结一致的人类成员。 同时，南方国家也会在它们的自助努力中得到重大鼓舞。

没有世界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我国不遗余力地振兴世界经济和援助发展中国家，同时还促进自己经济的国际化。日本充分认识到其重大责任，决心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自去年以来，日本在执行一项周转使用三百亿美元的方案，并在执行一项在三年过程中向萨哈拉以南和其它非洲国家提供五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我期待着同有关国家讨论进一步执行这些项目。 在经济合作问题上，我认为，促进年青人间和年青的企业管理者间的交流以及技术转让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认为，为了在公共管理及教育方面取得进展，人力资源发展和人际间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日本为实现此目标正予以充分合作。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区域问题的解决。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是结束正进入第八个年头的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在这块世界文明摇篮的土地上重建和平和恢复海湾水域的宁静。

安全理事会最近一致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这一决议是在尽可能注意到当时有关各方立场的条件下起草的。安理会期望得到双方信任的秘书长在执行决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认为除此没有其它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强烈敦促双方尽快结束冲突，建立起决议中要求的持久和平。日本一贯尽力恢复和平，现在正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诚恳地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我国愿意继续支持秘书长的积极努力。世界人民真心希望看到伊朗——伊拉克冲突结束，我坚定地希望，两国都能对这一愿望做出反应，并采取明智行动。

此外，我必须强调，作为一项总原则，所有国家严格克制向双方提供武器对于结束任何冲突和建立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其它地区，在满意解决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所有外国军事力量必须不加拖延地从这两个地区完全撤走。日本坚决支持在那里建立真正民主、独立、不结盟和中立的主权国家。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公然违反了种族平等和尊重人权的原则，必须迅速彻底地予以废除。

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应通过直接谈判，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取得和平统一。我支持作为统一的第一步，联合国接纳南北双方。我热诚希望在明年举行的汉城奥运会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聚集一起，充分参加，使这次奥运会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节日，并希望通过体育运动促进东西方友谊，特别是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此外，人类还未能逃脱由于人类争夺所引起的冲突和战争的恐惧，也还未能避免重大自然灾害的破坏。借此机会，我要强调联合国需要迅速而有效地提高并加强其协助防止自然灾害和提供救灾服务的能力。

下面我想简略地谈一谈在世界行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光明的前景以及日本如何能够提供合作，实现这样的希望。

简洁地说，我感到我们将看到一种全球趋势出现，人们将把自己从十九世纪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地人民想要迅速逃脱持久的核武器威胁的迫切愿望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而且，各地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何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之下，都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在自由和创造基础上的根本的经济规律比意识形态更加有力。

这种趋势体现于全世界强力支持美苏迅速举行最高级会晤，体现于反对东方及西方经济政策中过份的中央控制和保护主义。随着这一新出现的趋势在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传遍全球，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必将衰亡，世界将由对抗走向和解，由冲突走向合作。这样，促进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潜力将显然出现，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方法将受到人们的重视。

现在，再谈一点我对打破东西方僵局的想法。不幸的是，当前东西方对抗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当我们面对面进行交谈时，我们发现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属于同一人类，基本上都抱着良好的愿望。但是，一旦置于国家范畴之内，人民往往似乎起了变化，因为他们受到国家规章制度的操纵，站到了国家之间冲突和争夺的前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和不协调永远不会彻底克服。

对那些被委以治理国家的实际责任的人来说，要逃避这一现实决非易事。核武器固有的进退两难的矛盾是：尽管它们具有灾难性毁灭的潜力，但是一方认为只要另一方拥有核武器，它也必须拥有，以便保持共同威慑。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摆脱这一矛盾的道路，消除我们的怀疑和恐惧，回到一个安全和信任的世界，难道这不能再次使我们的良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向导？

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美苏最高级会晤以及那次会晤中在达成一项协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可以说是希望的曙光，预示着可以逃脱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报应。这一历史性的裁军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吹起了一股清新的和谐与合作的微风，我满怀希望，希望它将有助于产生能源，特别是可以用以援助最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负债累累的国家，并且还可以保护全球环境的能源。正如印度支那的历史和阿富汗当前形势所明确证实的那样，战争并不解决问题，相反，它破坏有关国家的社会稳定。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通过各国政治家的明智，历史前进的道路可以扭转。

自从东西方集团出现以来，大约半个世纪过去了。两个阵营的人民对自己的制度都有过自豪和信心，但是，肯定有时他们也有过怀疑。现在正是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去了解我们的同类所创造的不同社会的现实情况的时候了。既然现在可以用卫星电信进行信息实时交流，难道双方还不应该坦率、诚挚地敞开心扉，相互展示他们各自国家的现实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我坚信，如果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作为属于同一人类的负有责任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会晤，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这将为全球四方的人类进入一个和平对话和竞争共存的新时代铺平道路。

而且，现在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管理中出现了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现象。我指的是这样的事实，例如，走向自由化及加强市场经济原则的趋势正在发展。这些用语在各处越来越普遍流传的事实就说明经济规律在整个地球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于。最近，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地区，特别是靠近日本的亚太地区，出现了增长率显著的新兴工业国，我认为至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那里的这些国家利用了上述经济原则，正奉行着发挥其人民能力的政策。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正在进行的 perestroik（改革）和 glasnost（开放）将会给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带来什

么样的实际变化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又将会给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带来什么实际变化。

我们的使命是使这个星球——人类仅有的家园变成一个和平、自由的生意盎然的地方。所有国际组织都有责任为此目标努力，而联合国则是积极维护和平、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全体人民幸福的唯一全球讲坛。联合国负有重大的责任，它的继续存在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联合国确实未能完全达到人们在它成立时对它所抱的期望，因此，很容易对联合国有所批评。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我们怎么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维持秩序、促进我们的共同福祉？

正是在联合国处于困难的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会发生什么情况，从而投身于保卫、加强和改善本组织。联合国必须成为真正的“联合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维持和平的职能。就我国方面而言，我们一直在积极努力，主要是通过财政援助，支助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日本打算进一步研究如何在将来为加强这种行动做出更多的贡献。

日本自从成为会员国以来，一直将联合国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一直真诚地努力加强和改进联合国。

然而，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国际局势和联合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会员国的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创立时所预见的情况。这不仅使联合国呈现出多彩多样的特点，而且在我们跨进一个文明新时代时给联合国提出了未曾预见到的新问题。如果要使联合国能够对这些改变作出迅速的反应，那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对其加以改革。我也认为，不当地将诸如经济等等专门领域的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应当得到纠正。

我希望所有会员国共同审议这些问题，以确定联合国今后应成为怎样的一个组织。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破坏的世纪，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第一次核爆炸的悲剧，那么下一个世纪必须成为充满着和平灿烂阳光的世纪。迄今为止，和平仅仅在绵延不断的战争间息中断断续续地出现过。当然，维持与控制和平并确保其持久将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正视这些划时代的挑战不正是今天的政治家们的义务吗？毕竟，联合国是一个和平殿堂，政治家们聚汇于此，以建立持久和平为其共同目标，并决心以容忍精神共同致力于培养和维护不同的价值准则和文化，提高人类尊严。

值此之际，我保证将同在场的各位代表一道，作为聚汇于联合国的政治家中的一员履行其应负的重大职责。

在预计美苏即将就裁减和消除核武器举行首脑会议的情况下，本届联合国大会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希望。确实，这是联合国历史上为保证和平与共处而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让我们共同努力，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后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得到最好的祝福。

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在他的《生命颂》一诗中鼓动我们日日新又日新。我谨用该诗的最后一节来结束我的发言：

“那么，让我们忙碌起来，
坦然地接受任何命运，
不断成功，不断追求，
学会辛勤劳作和等待。”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日本首相所作的重要发言。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请允许我祝贺你被一致选为大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敏锐了解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将使你在今后数月内公正和明智地

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也欢迎约瑟夫·里德大使在主席台上就坐，祝贺他担任负责政治和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对此工作所挑的人选是再适当也不过了。最后，请允许我对你的前任乔杜里先生阁下所做的良好工作表示谢意。

当联合国本届大会举行之际，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进程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将于年底举行首脑会议。两个超级大国将要签署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两国间的关系现已具有了一个日益重要的合作方面。

这些事态发展不仅涉及直接有关的三个大国。当这些国际重新调整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所产生的影响波及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出现的结果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必须适应这些变化。重新调整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果断地重新考虑久被珍惜的思维习惯、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和行之已久的政策，如有必要，加以放弃。就人性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使我想起这一简单事实的是一位重要的国际领导人最近的发言。他于今年六月在联合国主持的一次裁军问题专家会议上说：

“……我们必须以分析的眼光审查对和平与安全的传统的处理方式和公认的观点。换言之，我们在当代这一重要问题上必须采取新的思维方式。在审查过时的教条和框框时，我们至少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就生存的最高利益而言，世界是一个整体，尽管存在着多式多样的形式。……第二个结论是任何国家如不企图削弱其它国家的安全，那么它自己就会有更大的安全。”

我想强调最后那句话。作这一发言的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尼赫。如果说一个超级大国尚且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那么任何其它国家就不应欺骗自己，脱离现实地认为自己可坚持走早已走的老路。历史充满了试图如此行事的国家留下的废墟。

联合国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调整时期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使联合国能重新调整国际组织运作的方式以及国与国相处的方法。如果联合国的宗旨和诺言未能完全实现，那么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帮助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去适应现在正进行着的深刻变革方面，联合国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小国构成联合国的绝大多数。

我认为联合国大有可为。说说联合国无关紧要之类的风凉话是很容易的，但这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几乎很少有人曾经参加过大国之间的私下讨论。也没人有能力直接影响各大国缓慢地、不可避免地调整其关系时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评价。只有在联合国，我们才能平等相处。

联合国，尽管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但仍然是一个至少有能力保护小国权利和利益的唯一组织。对于国际组织是否存在，大国也许并不在乎，但是，对于为祖国而战的纳米比亚人和巴勒斯坦人来说，对于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人来说，对于在世界各地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占领的所有被压迫人民来说，只有联合国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即当大国们重新调整其阵营的时候，人民的利益将不会被遗忘。

因此，联合国处在一个帮助小国适应正在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的独特位置上。只有在联合国内，我们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只有联合国才能够采用一种有助于缓和改革过程中的痛苦的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联合国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一种表明自己意愿的方式，那就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联合国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即使它不完全支持某一具体的决议，也不应感到受到威胁。每一个国家，不管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也都是同一个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联合国促使各国认识到什么才是最终符合它们自己最高利益的东西，尽管有时违背了它们的意愿。把联合国仅仅看作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反映是错误的。联合国是为所有人说话的。在坚持法制和正义的普遍原则方面，联合国的作用超越了国家的和特定的范畴。同时，在谈到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不可低估的共同利益时（尽管也存在其它一些使

我们产生分歧的因素)，联合国的情况亦其如此。

各国的所作所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联合国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任何国家，无论怎样冥顽不灵、麻木不仁，都不会永远无视联合国。一个适当的例子就是柬埔寨问题，这个对于我国所处的地区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问题。联合国对于会员国利益的确定是具有影响力的，而柬埔寨问题正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例证。

在1979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柬埔寨遭受侵略和占领问题的时候，越南一开始曾否认派遣部队进入柬埔寨。后来，越南又声称只派了志愿军前往。最后，在联合国的舆论压力下，越南才承认它是派了武装部队进入柬埔寨，但越南坚持说他们是应金边政权邀请才进入柬埔寨的，而这个政权是在入侵之后，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这的确使人感到是车拉着马进入柬埔寨的。

联合国的压力还改变了越南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否必要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1980年1月5日，越南外长和他的印度支那同伙们签署了一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公报。他说，“柬埔寨的局势不可逆转。”他还宣称，“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徒劳的也是无用的。”六年半之后，越南在一系列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压力下，同意政治解决办法。越南外长在同样一类会议上，签署了一份公报，承认他必须与其它国家一道工作以达成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从否认问题的存在转变到承认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是迈出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应当归功于联合国；但这仅仅是第一步。为了使越南迈出第二步，即真正开始寻求政治解决的谈判，联合国必须通过继续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来说服越南。如果想要使政治解决具有持久性，那么这种办法必须是正义的。政治解决必须能够处理有关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用两面派手法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幌子。

戈尔巴乔夫先生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一简单的真理，他说：

“最崇高的智慧在于毫不利己，更重要的是绝不损人利己。大家必须感

到都具有同样程度的安全感。”

我们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盟友们都能同意他的远见卓识，并顺从他的忠告。

在制订体现这一原则的各项建议时，联合国同样有其重要作用。大会以压倒多数一再通过的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决议，概述了这一解决办法的轮廓。这些决议考虑到了有关各方的利益，其中也认真考虑了越南的利益。这些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不应看作是哪一个国家或哪一方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方的胜利，而应看作是人类的胜利。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绝非不光彩或不利的东西。

最近，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穆赫塔尔·库苏马阿特马贾教授提出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完全符合联合国的精神，其中建议召开柬埔寨各方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将考虑到，柬埔寨问题同样应在高棉人不同派系之间求得解决，自1979年1月柬埔寨问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次提出审议以来，越南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但显然，越南作为在柬埔寨驻有军队和行政官员的占领国，有其特有的能力来决定高棉人之间的这样一次会议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或者仅仅是逢场作戏。

因此，库苏马阿特马贾教授的提案的内容是：越南应对我们的考虑作出诚恳的反应，参加到高棉人的会议中来，虽然不一定就在最初阶段。但遗憾的是，越南人否认他们在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举足轻重，不同意参与此类会谈。

与此相反，越南企图歪曲已经达成的谅解的性质。越南声称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印支国家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并声称国际社会如果想要帮忙，那么它就必须拒绝采取支持一方的立场。简单明了的事实是越南不同意参加任何旨在导致其从柬埔寨撤军和使柬埔寨重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谈判。

如果联合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再是明确而有原则的，那么，这对柬埔寨人、对东南亚人乃至国际社会都将是一个悲剧。联合国曾迫使越南接受这一事实，即：存在柬埔寨问题。它需要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仍将继续迫使越南接受一个以《联合国宪章》原则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国际社会和东南亚国家为寻求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东盟各国将继续作出真诚努力以寻求解决办法。我们将继续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保持密切联系。他已向越南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即：他决定休假一年，以便使他能够同任何一方进行讨论，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旧是在柬埔寨国内外唯一受到广泛尊敬的柬埔寨领导人。没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参与，就不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应该敦促越南领导人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直接对话。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否认国际变革的企图最终一定是徒劳的。现实主义有这样一种很麻烦的习惯，它对哪怕是地道的鸵鸟式人物都很苛求。当几个主要大国重新考虑决定下世纪国际政治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的参与有助于保证我们在不过份拖延和没有过多苦痛的情况下适应新的形势。然而，我们在承认适应的必要性时，绝不能忽视某些固定不变的参照点。《联合国宪章》体现了这种参照点，并含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是我们在为生存而适应环境时有义务要遵守的。

这就是联合国的独特性；它既是坚定不移的工具，又是变革的工具；它是一种手段，能保证必要和不可避免的适应有明确的目的，而不是随意或玩世不恭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失望，我继续相信，凭着联合国的毅力和献身精神，柬埔寨、中东、南非和世界许多其他麻烦地区的问题取得公正解决是可能的。联合国是一个精明炼达的机构，它能使其成员在国际政治的险滩中安全地航行，并到达国际秩序的安全港口。寻求运用联合国的意愿仍是我们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

下午 1 2 点 4 5 分散会。